



金元赋史

The History of Fu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牛海蓉 著



人民出版社

金元赋史

The History of Fu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柴晨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赋史/牛海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485-6

I. ①金… II. ①牛… III. ①赋-诗歌史-中国-金代②赋-诗歌史-中国-元代 IV. ①I207.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541 号



金元赋史

JINYUAN FUSHI

牛海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75

字数:510 千字

ISBN 978-7-01-014485-6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2006年,牛海蓉老师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出站,她表达了来湖南大学文学院工作的愿望,其合作导师钟振振教授也向我郑重推荐了她。我当时担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看了她提供的材料,就毫不犹豫地同意接收。牛老师来到湖大后,我因为长期从事辞赋方面的研究,且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辞赋通史”的研究任务,便希望她能够将研究重心从“词”转到“辞赋”方面来,并明确建议她全力投入“金元辞赋”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她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迅即华丽转身。几年来,她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金元辞赋的学术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紧接着,她的“金元赋史”系列,又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在金元辞赋研究领域最有实力、成绩最著的学者。

摆在面前这部煌煌四十余万字的著作《金元赋史》,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课题,也是“中国辞赋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书以时代为序,分别寻绎和探讨了金代、元代前期、元代后期辞赋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作者紧扣科举选士制度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律赋与古赋的盛衰消长,文体赋、骚体赋、诗体赋的体式分野,义理赋与抒情赋的内容迭变等赋史上的要点,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细致分析,来描述和勾勒金元时期辞赋的发展轨迹。

本书不仅在选题上具有创新性,论述中也胜义迭出。例如作者把元代辞赋的发展以元仁宗恢复科举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充分考虑到南北辞赋从差异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后期也区分了受科举影响的科场赋和科场之外的有为之作,使元代辞赋演变的过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一目了然;对于元代科场赋作的评述,不仅注意到它作为科场之文共同的缺点,也挖掘出它作为当时成功举业之文的优点所在。此外,对祝尧《古赋辩体》的赋论思想剖析,对杨维桢赋史地位的评价,对于元朝后期辞赋“祖骚”、“宗汉”、“承宋”等特色的分析归纳等等,也都全面准确。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改变了以人为纲、“录鬼簿”式的文学史传统写法,而以时间为经、以作品为纬建构赋史的网络,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也避免了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大赋家,还注重诸多的小赋家,几乎把所

有的赋家、赋作、赋论纳入研究视野,归纳分析,探寻赋史发展的脉络,这些都应该肯定。

总之,本书对金元辞赋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探讨,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金元赋的研究,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分体断代文学史,填补了金元赋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牛海蓉老师还很年轻,具有很不错的学术素养,尤为可贵的是,在当下颇为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依然能保持一颗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执着之心。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她学术地位的提升,并成为她继续在辞赋研究学术道路上行进的新起点。我期望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郭建勋

2014年10月于长沙岳麓山寓所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金代辞赋	7
第一节 金赋概述	7
第二节 “借才异代”时期的赋	13
第三节 “国朝文派”时期的赋	18
第四节 赵秉文对辞赋的变革及其赋作	24
第五节 “国衰世乱”时期的赋	33
第二章 元前期辞赋(上)——北方赋家	51
第一节 元前期北方辞赋概述	51
第二节 变革律赋、倡导古赋的呼声	54
第三节 古赋创作的题材内容	60
第四节 古赋创作的艺术特色	82
第三章 元前期辞赋(中)——南方赋家	95
第一节 元前期南方辞赋概述	95
第二节 变律为古的理论指导	97
第三节 古赋的创作实践	106
第四节 古赋的艺术特色	141
第四章 元前期辞赋(下)——天下一统与南北赋风的交融	158
第一节 京都赋等大赋的繁荣——“大哉乾元”的赋艺彰显	158
第二节 大力倡导与创作古赋的文章巨公——袁桷	167
第三节 道朝家,雨露同春,问甚江南江北——南北赋风的交融	178

第五章 元后期辞赋(上)——科举的恢复与古赋的繁荣	201
第一节 元后期辞赋概述	201
第二节 “古赋”辩体的必要性——祝尧《古赋辩体》	206
第三节 其他赋论家的理论建树	226
第四节 科举赋的优劣得失	239
第六章 元后期辞赋(下)——“文章之盛,其斯时欤”	256
第一节 非科举赋概述	256
第二节 科场之外的赋家之心	259
第三节 古赋之“古”的艺术涵容	299
第四节 科举赋集大成者、元末赋家巨擘——杨维桢	350
第五节 元代赋史的遗憾	373
附录一 《全辽金文》《全元文》与《历代辞赋总汇》金元赋对照表	381
附录二 《全辽金文》《全元文》及《历代辞赋总汇》未收金元赋作	395
附录三 辽金元赋存目及残句考	426
参考文献	442

绪 论

什么是赋？要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赋的起源说起。赋，曾被称为《诗》之“六义”之一，《毛诗序》“六义”排列是：“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①“风”、“雅”、“颂”已在《诗》中将 305 篇分别归于其下，明显地有诗之三体之义，而赋、比、兴则否。汉代学者开始给赋、比、兴下定义，郑玄的解释是：“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②可见，赋实是《诗》中一体，是与“比”、“兴”并列的一种表现手法。

赋作为《诗》的一种表现手法，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于与屈原同时代的荀况，正式定型于汉代的大赋。《荀子》中有《赋》章，分别铺写“礼”、“知”、“云”、“蚕”、“针”等五种观念或事物，虽然还近于《诗》体，却是以赋名篇之始。而在赋的发展成型过程之中，又与“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混淆纠缠。“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提法，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③

① 《毛诗序》，见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 1，《唐宋注疏十三经》第 1 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3 页。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 23，《唐宋注疏十三经》第 2 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28 页。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春秋时用《诗》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歌”《诗》,即有音乐伴奏的,一是“赋”《诗》,也称“诵”《诗》,即没有音乐伴奏的。《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公使(师曹)歌之,遂诵之。”^①指的就是用《诗》的两种方法。显然,班固这里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是就用《诗》的方法而言的,既无关乎诗体的定义,也不涉及赋体的定义。

而且,“赋者,或造篇,或诵古”^②,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诵《诗》或者说“诵古”的条件不复存在,于是“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不仅意味着“造篇”大胜于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兴文体——赋的出现。当然,汉人虽然意识到屈原、荀子的作品在文体上不同于《诗》的特征,但并没有后人“辞”与“赋”的分别,而概之曰“不歌而诵谓之赋”,把屈原的作品也称之为“赋”。除了班固这里的“作赋以风”,扬雄《法言》亦如此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③

由于赋《诗》之制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发挥政教功能,汉人认为继《诗》而起的“赋”也应该承担起这种诗教的功能。于是对屈原、荀况二人“作赋以风”的用心以及作品内容上的“恻隐古诗之义”特加表彰,而对赋体定型以后在逞辞方面的艺术特色则予以贬抑。班固除了在此处引用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语,对赋在文辞方面的过度铺张加以贬斥,在其《两都赋序》中又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④强调了赋的政教功能。

及至魏晋六朝,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赋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不再以政教功利要求赋,而是确认它属于美文学范畴,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⑤陆机《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⑥都成为经典性言论,而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则明确地阐述了赋不同于《诗》的文

① 孔颖达疏:《左传注疏》卷32,《唐宋注疏十三经》第3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4页。

② 《左传》隐公三年引郑玄语,见孔颖达疏:《左传注疏》卷3,《唐宋注疏十三经》第3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页。

③ 扬雄:《法言》佚文,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④ 班固:《两都赋序》,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⑤ 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⑥ 陆机:《文赋》,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体特征及美学风貌: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①

刘勰对于“赋者,铺也”所下的定义与《毛诗序》所谓“诗有六义”之一的“赋”相同,这种相同只限于艺术而不涉及文体,所以说“《诗序》则同义”。同时,这种“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赋体作品与《传》云“登高能赋”所专指的《诗》,在体裁上不能混同,所以说“《传》说则异体”。赋虽源于《诗》,但与《诗》是“枝干”关系,前人所谓“不歌而诵”“古诗之流”都是指向《诗》与赋之间的源流关系。到了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等作以“赋”名篇,赋才与《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种独立文体。这些作品以主客对话的形式展开,往往竭力对讲述对象作种种形容与夸张的描写,这种形式是与《诗》区别的开端,是赋体的最初面貌。刘勰不仅厘清了赋与《诗》的关系,接着又说明了赋体的兴盛过程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的特点: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诗》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②

①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按: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班固又对刘歆《七略》“删其要”而写成《汉书·艺文志》,故刘勰云:“刘向明‘不歌而诵’。”

②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赋“兴楚而盛汉”，在题材内容上无所不包，在体制上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与“触兴致情，因变取会”的小赋。

可见，赋是定型并盛行于汉代的一种专事铺叙的文章，是以“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以“颂美”和“讽谕”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

在赋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除了与上文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的用《诗》之法相混淆，也与“辞”的称法相纠缠，而“辞”与“骚”之间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更增加了概念的含混程度。

在当今许多学术著作与论文中，有称屈原、宋玉之作为“赋”或“辞赋”，有称司马相如等的赋为“赋”或“辞赋”，也有将楚辞与后代的赋称为“辞赋”等等。其实，“辞”作为一个文体范畴，本是屈原、宋玉等楚人创作的“楚辞”的简称。不过，这个文体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汉人提到“辞”时，最开始也没有文体区别的意义，而是“好尚文辞”之义。同时，从“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角度，他们把《诗》之后不能歌唱、只能诵读的作品统称为赋，如：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①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②

“好辞而以赋见称”，指好尚文辞而擅长写赋。在汉人的意识里，不仅屈原的作品“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他们的作品也只能诵读，不能歌唱，也是“赋”。“南楚好辞”也是指南楚崇尚文辞之美。“只有当王逸（东汉）在刘向（西汉）的基础上，将屈宋之作及汉代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仿作编成一本专书，对这些作品加以详尽解说，并将其命名为《楚辞章句》的时候，‘楚辞’才真正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称谓被确定下来。”^③值得注意的是，《楚辞章句》中收录宋玉的作品，不是他的赋体作品《风赋》、《钓赋》等，而是“骚体”作品《九辩》、《招魂》，贾谊的作品，也不是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而是《惜誓》。大概随着赋体的兴盛与定型，人们已经发现像这些具有“楚声”特点（句中多用“兮”字）的抒情作品，与体物之赋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称之为“楚辞”。

① 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8页。

③ 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由于“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最具代表性,汉魏时人又多以“骚”指代屈宋这些楚声作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既有“诠赋”,又有“辨骚”: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①

称《离骚》为《骚经》,在“辨骚”的总题下论述包括汉人辞作在内的所有楚辞作品。既然《楚辞章句》中屈原、宋玉的这些作品更多地被人们称为“骚”,那么《楚辞章句》之外的“楚声”作品——汉代的或者以后的,由于也有以“辞”命名的,则被另辟一体,称为“辞”。比刘勰稍后的萧统《文选》,于“骚”、“赋”之外即辟“辞”体,收入汉武帝《秋风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两篇。

可见,辞与赋各有特点,广义的“辞赋”包括“楚声”的“辞”在内,狭义的“辞赋”其实仅仅指“赋”,也即在汉代正式形成的赋体文学。本文所论即是指狭义之赋。

当然,即便是狭义的赋体文学,其内部也是纷繁复杂的。因为在汉代赋体定型之后,不仅那些以赋名篇的作品是赋,有一些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枚乘《七发》等,由于具有赋体文学的基本特点,也是被当作赋来看待的。后世不少文章,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韩愈《进学解》之类赋体文,实质上也应归入赋类。尤其是受枚乘《七发》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七”体^②,曹植《七启》、张协《七命》都是名篇。直至元初,还出现了王应麟《四明七观》、袁桷《七观》等七体作品。作为赋的一种变体,“七”体也应归入赋类。

就赋文学的形态而言,在汉代就有骚体赋、散体大赋与诗体小赋的差别,其中散体大赋最能代表汉赋的主流。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赋又出现了六朝俳赋(或称骈赋)、唐代律赋、宋代文赋等不同的形态。马积高《赋史》说:“从体制上说,赋的发展到宋就停滞了,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至于

① 刘勰:《文心雕龙》,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② 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傅子(傅玄)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至三十五卷列“七”一门,收枚乘、曹植、张协三篇。《隋书·经籍志》录有《七林》十卷,标撰者之一是下景,又录谢灵运集《七集》十卷,颜之推撰《七悟》一卷。惜今皆不存。

赋的内容,则每一个时期都有某种新的特色。”^①的确,金元之前,赋的各种体制形态已经完备,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大的发展,但是,金元是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一个“入主中原”,立国之初即承唐宋旧制,以律赋取士,一个“一统天下”,中期恢复科举后,以古赋^②取士,时代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政策的不同、赋家心态的不同等等,使赋文学不仅在内容上有新的特色,而且在形态上也呈现出某种新变。金元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辞赋史风气转变的关键时期,此后的明清两代,除了部分考试使用律赋以外,大都以元朝确定的“祖骚宗汉”的古赋传统为依归。金元辞赋是如何从唐代律赋、宋代文赋中走出来,并向“骚汉”传统复古,这一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其中有哪些为学界所忽视的关键点?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所谓“金元赋史”就是探讨在金元这个特殊时期赋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体制特征。

①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② 按:“古赋”之名,始于唐代,以与律赋相别(“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1,见王冠辑:《赋话广聚》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元以古赋取士,初始对于古赋的内涵,意见并不统一,后经祝尧《古赋辨体》,多以“骚汉”为古。

第一章 金代辞赋

第一节 金赋概述

金朝自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1115)至末帝灭亡(1234),历时119年。这个由完颜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①立国之初即实行汉法,设科举以取士。元代王恽云:“金源氏崛起海东,当天会(金太宗年号)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②《金史·选举志》亦云:“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③

金代科举以进士科为正科,包括词赋、经义、策论三科。在三科之中,经义科与策论科时开时辍,前者举行了26次考试,且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后,第一人不再称状元,视同词赋科第二,后者仅举行过18次考试。而词赋科与金朝科举的历程始终相伴未有间断,共举行了43次考试。^④词赋科试赋、诗、策、论,而赋是其中最紧要者,刘祁云:“国家初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见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⑤特重词赋一科的情形必然使知识分子埋首文翰,倾心辞赋的创作。元好问《中州集》云:“明昌、承安间,科举之学盛,大夫士非赋不谈。”^⑥直到

① 脱脱等:《金史》卷125《文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3页。

②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

③ 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0页。

④ 周腊生:《金代贡举考略》,《孝感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⑤ 刘祁:《归潜志》卷8,《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7页。

⑥ 元好问:《中州集》卷10,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0页。

金朝末年,国衰世乱,词赋依然盛行:“时金将亡,儒者犹习文辞为进取计。”^①金朝自上而下都非常重视词赋,不仅国子监把优秀程文及习作镂版以行,为士子取法,如《青云赋》、《孟四元赋》,^②士子个人也有赋集行世,如孟宗献:“尝著《金丹赋》行于世,其诗词亦有集。”^③

如此,金代辞赋的作家作品应该是非常繁盛的,元好问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上记载了诸如此类的事实,使我们得以窥见金朝辞赋繁荣之一斑:

刘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刘中,中明昌五年词赋经义第,“诗清便可喜,赋甚得楚辞句法。尤长于古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杨云翼,明昌五年经义进士第一人,词赋亦中乙科^④;史肃,“古赋亦奇峭”;王特起,“长于辞赋”^⑤;冯璧,“少日在太学,赋声籍甚”;麻九畴,“兴定末,府试经义第一,词赋第二。省试亦然”^⑥;王琢,“所著《中圣人赋》,今世少有能到者”;王元节,“婿于南山翁(刘撝),传其赋学,第进士”;景覃,“年十八,有赋声”;周驰,“经学出于醇德先生王广道,赋学出于泰山李时亨”,有《亚父撞玉斗赋》,已佚;崔遵,“少日在太学,有赋声”;王万石,“住太学,有赋声”^⑦;高有邻,“时相议绌词赋,专明经,德卿以赋有谏诤之义,反复诘难,竟得不罢”;韩玉,明昌五年经义、词赋两科进士;赵伯成,明昌五年经义、词赋两科进士;张介,正大元年间经义第一人,“幼有赋声”;胡汲,“少有赋声”^⑧;郝天挺,“少日有赋声”;曹用之,“幼有赋声,屡中甲乙”;邢安国,“少日有赋声”;马舜卿,“在太学,有赋声”;耶律履,“尝以乡赋一试有司,以露索为耻,遂不就举”;郑子聃,“少日有赋声,时辈莫与为敌”;赵承元,大定十三年词赋第一人;张行简,大定十九年词赋第一人;张櫟,明昌五

① 苏天爵:《元故征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② 浦铣著、何新文等校证:《历代赋话校证》“正集”卷12:“[铣按]《天下书目》,北京国子监板书有《青云赋》五十片(篇),《孟四元赋》一百十三片(篇)。又成德《禄水亭杂识》,国学镂板有《孟四元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③ 刘祁:《归潜志》卷8,《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8页。

④ 元好问:《中州集》卷4,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6—3350页。

⑤ 元好问:《中州集》卷5,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1—3358页。

⑥ 元好问:《中州集》卷6,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1—3363页。

⑦ 元好问:《中州集》卷7,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1—3382页。

⑧ 元好问:《中州集》卷8,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4—3416页。

年词赋第一人;曹珏,“早岁有赋声”;王升卿,“有赋声”^①。

其他文献也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如《金史》:

高衍,字穆仲,辽阳渤海人。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衍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年二十六登进士第^②;王渥,少游太学,长于词赋^③;马肩龙,在太学有赋声^④;郑子聃,“字景纯,大定府人。子聃及冠,有能赋声”;李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宋九嘉,“少游太学,有能赋声”,中至宁元年进士;李献能,“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⑤

但是现存金代辞赋仅有近 50 篇,尚包括一部分入元的作家作品。金赋留存绝少,其原因大致如下^⑥:

1. 金朝从贞祐南渡(1214)至金亡(1234),与蒙元进行了二十年的拉锯战,文献大量散失。如魏初云:“金国百有余年,以文章名家者,如党竹溪、王黄华、赵黄山、杨、赵二礼部、雷、李、王、麻诸公,不啻百数十人。其余为兵乱磨灭者,不可胜计。”^⑦苏天爵亦云:“金儒士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沔,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⑧

2. 金亡以后,受后来元、明两朝轻视,文献再度散佚。“金源有国百年,始尚武功,终务文治,大定、明昌间风雅辈出,凌南宋而上焉。惜经元、明两朝之嫉视,并其文字而轻蔑之。故名辈如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沔诸文集

① 元好问:《中州集》卷 9,见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1—3443 页。

② 脱脱等:《金史》卷 90《高衍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005 页。

③ 脱脱等:《金史》卷 111《思烈传》附,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455 页。

④ 脱脱等:《金史》卷 123《忠义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692 页。

⑤ 脱脱等:《金史》卷 125《文艺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725—2736 页。

⑥ 薛瑞兆:《论金代艺文的历史遭遇》中还提到了“元明两代窃取金人著述成风”,作为金代艺文流传绝少的原因之一。他引施国祁《吉贝居杂记》说,修《永乐大典》而征书时,金人文献“捆载满前,汗牛塞栋。在局者稍识文字,皆惊为无主之奇货。中间诸家小集,大可假借门面,于是相互没人,没人不已,竞相盗贩。至所存经史释道医律各种,实无取而备数者也。韵学算法尤不解,而无用者也。惟党、赵、王、元诸集,畏其大名,不敢公肆攘窃。自余可以全偷者没之,可以抽取者缺之。诸人既已各饱所欲,视阁藏反为弃物,不过按部计册,草草录目,随著翰林一员,典籍了事。是以杂著十亡其七,诗文十亡其八,岂非金源文士之不幸,遭此狗鼠之奇货耶?”,并说:“这种见解虽为推测,却不无根据。”(《暨南学报》2006 年第 4 期)其实,这种推测想象之辞过多,令人难以置信。本文不取。

⑦ 魏初:《通斋先生诗集序》,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8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9 页。

⑧ 苏天爵:《三史质疑》,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40 册,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2 页。